

# 武汉抗战时期政治思想文化特质探赜

赵炎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武汉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特质甚多,其中政治思想文化特质最为突出。其具体表现有四:政治理想主要体现为民族国家至上与深化反帝反封共存;价值理念秉持致用精神与坚守三民主义递进;实际运作展现为重塑政治权威与推进民主政治互动;内在实质昭示出注重具体合理与追求目标合理统一。

**关键词:**武汉抗战时期;政治思想文化;政治理想;价值理念;实际运作;内在实质

中图分类号:K265.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4)01-0086-07

在中国近代史上,伴随沪宁沦陷、国府西迁,武汉遂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国共合作基地。而武汉抗战波及战场甚广,持续时间较长,给日军打击最大,迫使其终止全面进攻。迄今为止,学界考察其具体史实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对其抽象性文化特征亦不乏一定论及,如笔者认为其历史文化特征凸现为价值诉求、理性态度、实践品德与道德境界等方面<sup>[1]</sup>。虽然如此,从中国抗日战争史角度来看,如此理论诠释仍甚为薄弱,客观上有待深化。事实上,此期政治思想文化特质颇为鲜明。对此,当代学者唐宝林认为:“这个时期,与其前后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在政治方面有明显的特点,即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就全国政权而言)最团结、最民主、最进步的时期。”<sup>[2]</sup>如此概括颇有见地,基本揭示出其主要政治特征,给人以积极启示。需要指出的是,其相关论述仍过于笼统,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总体来看,此期政治文化特质主要体现为政治理想民族国家至上与深化反帝反封共存、价值理念秉持致用精神与坚守三民主义递进、实际运作重塑政治权威与推进民主政治互动和内在实质注重具体合理与追求目标合理统一等方面。

## 一、政治理想:民族国家至上 与深化反帝反封共存

从思想文化角度审视,武汉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特质甚多,其中政治思想文化特质首当其冲。从理论上而论,近代政治思想文化主要关涉民权

主义,具体涵盖尊重人权、主权在民、权力制衡与崇尚法治等核心内容<sup>[3]</sup>。如果将其置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语境下,此论可谓深中肯綮,昭示了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倘若具体到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不同阶段,其内涵可能侧重点有别,各具其时代特色。在武汉抗战时期,其政治思想文化特质主要体现为政治理想、价值理念、实际运作与内在实质四个方面。就政治理想而言,它凸显为坚持近代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不断深化反帝反封时代主题,以最大限度来谋求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统一与稳定,进而促进中国近代化逐步走向深化。

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坚持民族国家至上可谓把握住了问题的核心。事实上,武汉抗战时期的政治理想实乃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民族国家利益的自然延伸与逻辑发展的具体外化。伴随清季民初新旧政治鼎革,追求国利民福遂成为革命志士的当然价值诉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奋起抵抗,其中武汉抗战演绎出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活剧,而坚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则是其揭橥的爱国主义大旗。

“卢沟桥事变”爆发尤其是南京陷落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欲摆脱现实窘境,中华民族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其时,大力弘扬民族主义精神遂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因为此举能最大限度激发广大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而武汉抗战可谓其激励、感召下的时代产物<sup>[4]</sup>。

收稿日期:2013-11-12

作者简介:赵炎才(1963-),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复提倡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号召国民积极奋起抗战。如蒋氏在庐山发表谈话时曾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sup>[5]</sup>。在他看来,中国必须保全其主权,维护其行政与领土完整,保持其民族生命。后来,他明确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sup>[6]</sup>。综观其言论,类似表述可谓比比皆是,如“完全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前提,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sup>[7]</sup>;一切言行“都要以国家民族为唯一前提,以求得抗战胜利为第一要务”<sup>[8][136-137]</sup>。与此相呼应,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也强调“国家民族本位”<sup>[9][16]</sup>;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也呼吁“国家至上”,认为爱护国家应始终不渝<sup>[10][22]</sup>。可以说,民族国家至上已成为那个时代奏响的主旋律。

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提倡民族国家至上的主张可谓时间更早,理论表达更鲜明。这从1931年《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到1935年《抗日救国宣言》的具体表述中不难窥见一斑。1937年7月8日,针对“卢沟桥事变”,中共立即通电全国同胞,强调“中华民族危急”,主张实行全民族抗战。在毛泽东看来,民族革命抗战可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完整,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sup>[11][148]</sup>。对国共两党所提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主张,毛认为这“都是完全正确的”<sup>[12][134]</sup>。很显然,坚持民族国家至上已是当时各界的共同价值诉求,与中国传统民族国家内涵存有较大差异,具有明显近代色彩。

在坚持民族国家至上过程中,武汉抗战也逐渐深化了反帝反封的思想意涵。就反帝而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国家的正义性与必要性。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之时,蒋介石指出:对日抗战乃三民主义与强权暴力帝国主义之战争,亦即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不仅如此,此一反帝斗争范围亦呈现出由中国逐步扩及世界的大体趋势,在理念上开始与世界近代普世价值相对接<sup>[13][47]</sup>。在蒋氏看来,“卢沟桥事变”发展的结果不仅关系到中国存亡问题,而且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sup>[14][30]</sup>。有鉴于此,蒋努力将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西方国家区分开来,谋求联合世界正义力量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sup>[15]</sup>。如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武汉抗战中反帝斗争的时代特色。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持有相似思想,且具体论述更为周详。中国共产党认为今天这一伟大民族战争和中国过去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都不相

同,因为中华民族正处在历史上最进步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自寻死路走向崩溃。同时,全世界先进人类正准备空前广大的斗争力量来抵抗与战胜德、日、意法西斯魔王以争取世界光明前途。此三者结合保证抗日战争一定能最后取得胜利,而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一定要出现于东亚,“而且将造福于全人类”<sup>[12][123]</sup>。不难看出,较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反帝斗争,武汉抗战所进行的反帝斗争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具体实践均在一定程度上深化。

与前此反帝意涵深化相吻合,武汉抗战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反封斗争的历史内涵。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近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起近代民主共和国。然而,形式化民主而实质性专制却成为此后中国近代政治挥之不去的梦魇。即使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此一现状并无根本性改变。然而,在武汉抗战时期,出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生存之需要,蒋氏表现出一定的反封积极性。这突出体现在对传统道德理念的推陈出新、带有近代民主政治色彩机构的设立与藉法律保障人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诸方面。

就道德而论,学界倾向于诘责蒋介石藉复活封建主义文化来强化其专制独裁统治,是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反动,具有铲除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浓厚韵味。如将此视为蒋在武汉抗战前的主要价值诉求自然不乏其一定合理性。但时移势易,在武汉抗战时期,蒋虽并未根本放弃其原有政治立场,但所倡导的道德更多地旨在满足中国近代民族国家之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已超出了国民党一己之私的范围,如蒋曾明确指出:“战争的胜负,全在于精神”<sup>[16][9]</sup>。在他看来,倡行新生活运动在于革新国民生活习惯,振作其道德精神以适合于时代需要,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急之际,能有决心有勇气有能力来保卫民族国家的生存。很显然,其新生活运动已将反日侵略纳入其中,体现出一定近代民主性色彩。

在具体内涵上,按照蒋介石的表述,道德教条是以礼义廉耻为四维,而在实行方面则以忠孝仁爱为中心。从字面来看,这些概念简直就是传统思想的翻版,并无任何创新之处,然而一涉及到具体内涵,其闪光点则触目皆是。如蒋强调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力量就是我们民族抗战的最大武器。他在理论诠释“礼义廉耻”诸道德概念时积极谋求推陈出新,赋予其一定新义,要求人人怀有国民天

职,自觉“为国家尽忠,对民族祖先尽孝”,积极抵抗强暴消灭日本侵略者<sup>[17]</sup>。其时代积极进步性于此不难窥见一斑。

事实上,此期蒋介石所倡导的道德观与中国共产党人所崇尚的道德理念具有高度的理论一致性<sup>[18]</sup>。至于中共倡设国民参政会主要是针对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直接反蒋专制独裁的方法,利用其原有民主性机构,藉合作逐步打破其独裁专制的堡垒进而促其政治近代化。后来蒋介石赞同中共所提主张并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使之及时开始运作,成为集合全国抗日力量的政治平台,其反封建性不言自明。至于《抗战建国纲领》明确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民主价值诉求,同样具有一定反封建意义。坚持民族国家至上与深化反帝反封共存可谓武汉抗战时期政治理想的具体外化。

## 二、价值理念:秉持致用精神 与坚守三民主义递进

相对于政治理想,武汉抗战时期的价值理念凸现为立足于现实需要秉持致用精神与坚守三民主义递进。前者主要表现为国共两党在思想文化上超越了那种拘泥于以东西新旧为价值取舍标准的陈说,侧重于以是否有利于救亡图存来衡量人们的言行;而后者则体现为高扬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大旗,深刻把握其有利于中华民族和近代民主国家发展的精神实质以积极推进全民抗战,虽然不同党派的具体理论解读仍存有一定差异。

从理论上而言,秉持致用精神实际延续了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之精华。而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可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在近代的逻辑发展。揆诸史实,不难发现,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强调积极入世、关心现实、注重实践、讲求实效、齐家治国、造福民生,其真谛突出表现为自强不息、正道直行、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此一价值取向在中国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孕育、涵养和激励历代士人为国为民为天下锲而不舍追求真理、建功立业<sup>[19]</sup>。降及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已成为志士仁人应对时局、匡济天下、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重要理论武器。从总体来看,其外在形式主要体现为时代性与超越性互动,而其内在思想则为疑古、复古与创新的统一。从社会主体角度而言,它还具有自发性与自觉性相结合的特征<sup>[20]</sup>。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全面抗战时期,尤其

是武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秉持致用精神实际沿袭了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积极精神传统并结合时代需要而有所发展。

在蒋介石的思想中,传统文化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其中经世致用思想尤为突出。对此,有论者剖析到:蒋氏将中国道德范围内的“内治工夫叫作‘性命之学’,把知识范围外的外修工夫称为‘经世之学’,而以两者的均衡和统一即‘合内外之道’为学问的最高标准,也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境界”<sup>[21]</sup>。事实上,蒋氏倡导与颂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带有明显政治目的,他既利用其来追求专制独裁和积极反共,也欲藉此维护近代民族国家利益。比较而言,毛泽东对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认识更为深刻。这从其早期欣赏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到立下务实之誓言中即可窥见一斑。投身革命事业后,毛泽东更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社会上<sup>[22]</sup>。后来他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并日臻成熟。对此,有论者评析道:毛泽东所作的一系列理论阐述和实际贡献既是对经世致用精神传统的时代传承,更是对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超越<sup>[23]</sup>。正是由于蒋介石与毛泽东在秉持致用精神上互有交集,国共两党的抗战方略亦体现出一定致用精神,武汉抗战才最终演绎成一出动人的历史活剧。

其实,在武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秉持致用精神追求民族大义中自觉坚守三民主义之真谛。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谓一面颇具影响力的理论旗帜,其具体内涵可界分为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两部分。其中后者是“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在苏俄和中共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sup>[24]</sup>。孙中山逝世后,三民主义虽被国民政府规定为统治思想,但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根据各自需要对其作了不同理论解读。而蒋介石则一贯以孙中山的继承人和三民主义正统自居,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并将它与《大学》“四维”“八德”等联系起来。他在所有道德规范中将“仁”视为三民主义的核心,甚至将“行仁”与“剿共”并举。很显然,蒋氏之三民主义实乃对孙之新三民主义的严重曲解,成为其追求独裁专制的思想工具。故胡汉民对此曾加以猛烈抨击,称蒋氏之目的旨在“愚民”。西安事变后,蒋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卢沟桥事变”后,蒋即在庐山宣言抗日。“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sup>[25]</sup>,表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开始逐步转到实行民族抗战

的轨道上来。

在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一再重申三民主义与抗战之关系,而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则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规定为全国抗战行动及建国“最高准绳”。蒋氏指出:国民革命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而三民主义实为救国主义。鉴于中共“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今日凡能信奉三民主义努力救国者,政府不问其过去如何,均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sup>[14]28-30</sup>。蒋一再强调,值此民族国家存亡关头,作为三民主义信徒要“生为主义而生,死为主义而死,拼最大之牺牲,求最后之胜利”<sup>[26]</sup>。很显然,三民主义已为此期国民党号召民众积极抗日的重要精神武器。

事实上,全面抗战爆发后,尤其在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更为深刻,强调在此基础上实施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在其宣言中明确表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sup>[11]148</sup>究竟如何看待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曾做了深入的理论论证。他指出:因三民主义存在历史性变化,具体所指需要加以辨别。具体地说,共产党实际赞同的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非失去人民信仰的三民主义。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有必要适应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精神,两党重新合作,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但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革命的三民主义基本不相冲突。因此,我们愿意和国民党一道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sup>[27]</sup>。总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而后者则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sup>[12]160</sup>。

对国共两党均主张坚守三民主义的真谛,当时的张君劢深表赞赏,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立国要义,“主张个人自由而不忘社会公福,主张民族本位而不忘世界大同;其于采用西方政制,固已贯以吾民族性于其中矣。今之持共产说者,渐自阶级立场转而努力于民族生存;持极权说者,亦知‘法西斯派’主义难行于中土”<sup>[9]15-16</sup>。此论虽非完全契合事实,但多少道出一定问题实质。正因为国共两党能秉持致用精神,才能共同坚守三民主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一致共同

推进全民抗战顺利向前发展。

### 三、实际运作:重塑政治权威与推进民主政治互动

欲真正做到团结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武汉抗战中的政治运作凸现为围绕团结抗日重塑近代政治权威与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互动展开。所谓近代政治权威,是在实施维护近代民族国家利益、推行国家政治过程中,促进近代政治秩序稳定有序向前发展的综合性力量的统称。至于近代民主政治,既是中国近代政治价值诉求的具体体现,也是武汉抗战时期化解内部分裂、凝聚全国人心、确保强大抗战力量源头活水不至中断的有效手段。如此互动实可谓在中国近代外部主权严重受损情形下人民积极构建并强化内部政权的有益性尝试。

事实上,重塑近代政治权威与当时国内外严峻情形密切相关。其时,南京陷落后,中国的抗战形势可谓异常严峻。日本在军事上集中精锐主力近30万人逼近武汉。由于中国政府拒绝投降,日本遂加强了猛烈的政治攻势,视蒋介石为结束中国战争的主要障碍,明确提出不以蒋为谈判对手。这导致国民党内部妥协空气进一步弥漫,蒋在抗战中的政治地位严重削弱。欲赢得中国抗战最后胜利,客观上需要重塑近代政治权威,整合各种力量,凝聚全国人心,坚定必胜信心,推进创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对于如何重塑国家权威以满足抗战之需要,中共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在具体指示中明确指出:鉴于目前许多军队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必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会趁机而起,势必影响蒋之地位,有危及其继续抗战之虞,因此,在抗战过程中应“巩固蒋之地位”<sup>[28]538</sup>。后来,毛泽东也指出: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形成的。鉴于“武汉现正处于敌人的威胁中”<sup>[12]124</sup>,因此,欲滞敌人的进攻,发挥国民党的重要作用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势在必行<sup>[12]153-154</sup>。而在新环境中,为粉碎敌人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阴谋,全国应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务使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响<sup>[12]164</sup>。

为实现重塑近代政治权威之目的,真正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积极为此而努力。中共中央向全国宣告,除赞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外,取消一切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取消现在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sup>[11]148</sup>。周恩来还向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强调只有“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施行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攻之目的”<sup>[29]</sup>。

与中国共产党相似,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也勉力而为。蒋曾指出:“唯望我全国同胞不论男女老幼,个个人贡献能力,在中央领导之下,各尽责任,共同一致努力奋发,必先集中抗战力量,然后方得排除暴敌的侵略,使我们民族做一个堪与各国并立于世界的民族。”<sup>[30]</sup>全面抗战开始后,为提升国民党影响,加强蒋氏在党内权威,中国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设立总裁制,推举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总裁<sup>[31]</sup>。蒋对此深表欣慰,表示:“各政党均在国民党旗帜之下,团结一致,红军已编入国军系统内,而由最高统帅指挥”,国民党“愿与各党携手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sup>[32]</sup>。

当时的其他党派人士也充分认可此一国家政治权威。如左舜生指出:“国民政府为今日举国公认之政府,亦即抗战唯一之中心力量”<sup>[10]22</sup>。张君劢强调道:“方今民族危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sup>[9]19</sup>对此结果,有论者指出:由于此一团结的建立,蒋介石“不仅为国民党及其所主持之国民政府的领袖,而且也成为国内各党派以及全民族对日抗战的共同领袖”<sup>[33]</sup>。而武汉成为南京沦陷后战时首都和抗战中心与此不无一定关系,同时武汉抗战又使国民党近代政治权威得到更好的确立,因为近代政治新权威已超越了现存的党派界限,所追求的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也视民主政治为凝聚全国人心、增强抗战民族力量的重要手段。中共在宣言中明确要求国民党“实现民权政治及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sup>[11]148</sup>。事实上,国民党曾做过一定尝试,这主要体现在从1932年的国民参政会到1937年的国防参议会上。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向大会提议健全民意机关,蒋介石表示接受。后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非常时期应设立国民参政会”,遂将国防参议会扩大改名为国民参政会。同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根据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的组成包括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无党派代表。除此之外,国民政府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也相应设立省、市、县级参议会<sup>[31]</sup>。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蒋极力称赞参政会的积极价值,认为国民参政会有助于集中全民族力量来对付侵略势力以求得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国民参政会虽不是议会,但要树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础<sup>[8]134-135</sup>。后来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构逐步有所开放。

对参政会的设立,左舜生深表赞许,认为“此次‘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在此非常时期不忘国民参政机关之建立,国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之保障,亦即异日宪政实施之端绪”<sup>[10]21</sup>。毛泽东也称道国民党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sup>[12]154</sup>。相对于全面抗战前,国民党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确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有利于集合民族力量,促进抗战顺利向前发展。当然,国民党对民众抗战也采取一定的压制措施,如一些报刊还接连发表文章鼓吹独裁和反共,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提中也曾作了一定的必要斗争。

#### 四、内在实质:注重具体合理 与追求目标合理统一

在武汉抗战时期,政治思想文化的内在实质则彰显为注重具体合理与追求目标合理的有机统一。前者系指国共两党围绕武汉抗战的政治与军事努力均具有其具体合理性,并取得一定阶段性成果;而后者则表明武汉抗战并非孤立的,而是整个中国抗战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其所提出的战略战术还是所取得的成果,都为全面持久抗战的推进乃至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此二者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出武汉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不可低估的价值。

在武汉抗战时期,注重具体合理与追求目标合理的有机统一突出体现为重塑近代政治权威与推进民主政治进程的统一。揆诸史实,不难发现,重塑近代政治权威与推进民主政治进程可谓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中的两极态势。如此两极并非完全截然对立,而是具有其内在统一性,即藉此提升政府效能来巩固和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们彼此互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此期武汉抗战的实

际需要,所形成的合力有利于全面抗战的顺利发展,其军事意义显而易见。

从中国近代政治来看,其积极价值同样不可忽视。前已述及,在武汉抗战时期,重塑近代政治权威旨在满足全面持久抗战之需要。如将其置于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实际过程中去审视,不难发现,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有利于增强政府权威,提升政府掌控国家整体局面的实际能力,暂时平息业已存在的各种矛盾。正因为如此,当时各派政治力量捐弃前嫌,团聚起来,共同抗战。国民党内蒋系势力与反蒋地方实力派结束了纷争,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等人均出任了军政要职。中央与地方矛盾得到一定化解<sup>[31]</sup>。这在武汉抗战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由于重塑近代政治权威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环境下展开的,它客观上需要借用近代民主政治的内在结构来达到其目的,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当时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与运作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议会,但已初具议会的功能,是一个代表人民权力的政治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代议政治的宗旨与精神,通过它可以让国民更加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此一机关既发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作用,也在组织上成为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各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此外,国民参政会在增添民主气氛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显示中国政治生活在向民主化方向迈进<sup>[31]</sup>。其完善政治组织提升政府权威的功效不言而喻。

从近代政治文化而论,法治精神理应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取向。而在武汉抗战时期,法治所赋予的国民权力得到一定伸张。如《抗战建国纲领》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了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的范围并加以保障,整顿军纪强调运用法律制裁<sup>[16][12]</sup>等均是其具体表现。需要指出的是,在武汉抗战时期,国民党所推进的民主政治毕竟有限,不宜盲目夸大评价过高。

注重具体合理与追求目标合理的统一还体现在武汉抗战的短暂性与全面抗战的持久性的统一。从总体来看,国共两党对保卫武汉比较积极,总体认识也比较清楚,及时注意到武汉与全国、短暂与持久之关系,在此基础上来实施武汉抗战。蒋介石指出:此次抗战旨在始终保持我军战斗力,尽量消耗敌人力,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sup>[34][41]</sup>。要求全国同胞在今日形势之下不能徒顾一时之胜负<sup>[13][45]</sup>。在他看来,我军方略在空间上

不能因为狭小核心而忘广大之图,在时间上不能为一时之得失而忽视久长之计。就武汉抗战而言,其关键不在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继续抗战持久的力量。保卫武汉旨在迟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迁移东南与中部工业以进行西南建设,为实施全面抗战做准备<sup>[34][38]</sup>。

在退出武汉之际,蒋介石一再强调“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与“争取主动”。他指出:“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心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由于考虑是全面战争,任何城市的得失绝不能影响抗战全局。由于敌我利害短长正相悬殊,唯有处处主动,才能打击日本速决企图,消灭其宰割妄念<sup>[34][41]</sup>。在他看来,以中国广土众民,历史悠久,只要集中力量,持久奋斗,抗战必胜<sup>[35]</sup>。他一再重申:任何战争只要得到民众帮助一定胜利<sup>[16][11]</sup>,而中国持久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心实寄于全国乡村和广大强固民心<sup>[13][45]</sup>。

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相关认识在时间上更早,认识更为全面深刻。当时,徐州失守后,日军直指武汉,而国民党内部存有轻视武汉乃至放弃武汉的错误倾向。为纠正此一倾向,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徐州失守后,敌人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中心<sup>[36]</sup>。由于敌主力正向武汉进攻,保卫武汉、保卫全国是当务之急<sup>[37]</sup>。因此,“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sup>[38]</sup>。在这里,保卫武汉虽是重心,但并未忽视其他地方,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全国抗战一盘棋的思想。

为更好地推进全面抗战,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利用敌人全力进攻武汉机会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作战,以扩大抗战成果。在毛泽东看来,当保卫武汉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应发动全军全民的积极性来支持战争<sup>[39]</sup>。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sup>[28][538]</sup>。而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动员民众全力保卫武汉做了大量宣传与组织工作。这说明在准备和实施武汉抗战过程中,局部性与全局性实际密切结合在一起,颇难截然分开。

当日军逼近武汉之际,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军民正确对待保卫武汉问题,不应过分强调保卫武汉,而要说明应争取防御武汉更久,即使武汉不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会决定胜负,要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坚持与日寇

作长期的斗争<sup>[40]</sup>。毛泽东也指出:保卫武汉旨在争取时间而非死守,既要消耗敌人又要争取时间推动全面抗战。到了该放弃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避免大的不利决战<sup>[12][145]</sup>。后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报告时指出:放弃武汉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sup>[41]</sup>。同时,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故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非速决战<sup>[12][139]</sup>。可以说,武汉抗战虽以弃地转移而告终,但却打击和钳制了日军主力,客观上推动了全面抗战走向深化。

综上,武汉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特质虽甚多,但前述四个方面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它们虽各有侧重,但却密切相联,融为一体,彼此互动,共同发展。从总体来看,这些特质既是武汉抗战诉求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也是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需要。正因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产物,颇难用一般意义上的近代政治文化标准来衡量与审视。应该说,武汉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存有较大差别,因为后者的一元化的政治思维、传统式的政治伦理、分裂型的政治人格和虚幻性的政治思想不仅融合了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专制的阴柔与残暴,渗入了近代法西斯主义政治集权的独裁与血腥,而且还涂上了些许西方民主政治的色调<sup>[42]</sup>。如此明显的差别从一个侧面彰显出武汉抗战时期政治思想文化的巨大历史进步性,同时,对以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国民政府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政治资源,在其政治威望鼎盛时藉国家权力推行一党专政,漠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的民主要求,动摇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最终使其统治葬身在人民革命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sup>[43]</sup>。这充分说明武汉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所蕴含的积极历史价值并未因时间逐渐远逝而有所消蚀,而是伴随中国近代化的不断发展而熠熠生辉,至今仍值得珍视!

### 参 考 文 献

- [1] 赵炎才.武汉抗战历史文化特征管窥[J].学习与实践,2010(4).
- [2] 唐宝林.论武汉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特点[J].抗日战争研究,1999(2).
- [3] 汪林茂.晚清文化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41-442.
- [4] 赵炎才.武汉抗战与近代民族主义精神[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 [5] 蒋介石.一貫的方针和立场[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8:3-4.
- [6] 蒋介石.电全国厉行国民精神总动员[M]//程鹏.抗战以来蒋委员长言论集.芷江出版社,(年月不详):90.
- [7] 蒋介石.告全国军民[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8:124-125.
- [8] 蒋介石.国民参政会开幕词[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8.
- [9] 张君劢.张君劢原函[M]//程鹏.抗战以来蒋委员长言论集.芷江出版社,(年月不详).
- [10] 左舜生.左舜生原函[M]//程鹏.抗战以来蒋委员长言论集.芷江出版社,(年月不详).
- [11] 毛泽东,彭德怀,潘汉年,等.怎样争取最后胜利[M].上海:战时出版社,1938.
- [12] 毛泽东.论新阶段[M]//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
- [13] 蒋介石.告全国国民书[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8
- [14] 蒋介石.集中力量抵抗暴敌[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8.
- [15] 蒋介石.中国为世界和平而战斗[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8:53.
- [16] 蒋介石.驱除倭寇复兴民族[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8.
- [17]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与抗战[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8.
- [18] 赵炎才.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道德救国思潮管窥[M]//涂文学,邓正兵.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8.
- [19] 姜义华.中华文化读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7-31.
- [20] 赵炎才.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基本特征刍议[J].安徽史学,2003(2).
- [21] 秦英君.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J].史学月刊,1999(3).
- [22] 姜思毅.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J].中华文化论坛,1994(3).
- [23] 陈先初.毛泽东与实学传统[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下转第 98 页)

- [11] Ramon H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1, 31(4).
- [12] J B Taylor. The Hopei pottery industry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isation [M]// Michael Dill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Up to 1949*. BRILL/ Global Oriental, 2008.
- [13] 赵晓阳.美国学生海外传教运动与美国早期汉学的转型[J].*汉学与神学·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7辑)*, 2007.
- [14] 张雷.葛德石与中国近代地理学[J].*地理学报*, 2009(10).
- [15] George B Cresse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a survey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M]. New York and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4.
- [16] 李华伟.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馆藏与汉学研究资源[J].*新世纪图书馆*, 2008(1).
- [17]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谭朴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18] 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与中国现代文学及政治[J].*现代中文学刊*, 2009(3).
- [19] 沈一帆.观念的肇始:陈世骧与“中国抒情传统”的发明[J].*当代文坛*, 2012(2).
- [20] 李杨.“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J].*天津社会科学*, 2013(1).
- [21] 梅谦立.河北大学图书馆所藏西文珍本书基本目录[J].*国际汉学(第12辑)*, 2005.

[责任编辑] 勇慧

(上接第92页)

- [24] 丁守和.关于抗战时期思想文化的若干问题[J].*东岳论丛*, 1996(1).
- [25] 丁宁和.论抗日战争的思想文化[J].*近代史研究*, 1995(5).
- [26] 蒋介石.自信自立与自强[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1938: 21.
- [27]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59.
- [28] 中共中央.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M]//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1册.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538.
- [29] 毛泽东.致蒋介石信(1938年9月29日)[M]//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武汉抗战史料.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7: 86.
- [30] 蒋介石.争取最后胜利[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1938: 37-38.
- [31] 石柏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J].*抗日战争研究*, 1994(1).
- [32] 蒋介石.语法记者[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1938: 71-72.
- [33] 编者.《接纳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的表示》编者的话[M]//程鹏.抗战以来蒋委员长言论集. 芷江出版社, (年月不详): 8.
- [34] 蒋介石.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民众书[M]//程鹏.
- 抗战以来蒋委员长言论集. 芷江出版社, (年月不详).
- [35] 蒋介石.告全国青年书[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1938: 78-79.
- [36] 袁伟.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M].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1994: 341.
- [37] 中共中央.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M]//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1册.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525.
- [38] 毛泽东.关于发展华北游击战争致朱德等电[M]//《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组.八路军·文献.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1994: 188.
- [39] 毛泽东.论持久战[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12-513.
- [40]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日军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关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M]//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1册.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549.
-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94.
- [42] 江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文化评析[J].*史学月刊*, 1996(3).
- [43] 赵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研究[D].长春: 吉林大学, 2011.

[责任编辑] 李丹葵